doi:10.3969/j.issn.1674 - 117X.2017.04.018

西方生命虚构叙事创作新趋势

——以《马洛与莎士比亚秘史》为例

方群

(广州航海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西方生命虚构叙事是一种以历史人物的生命因子为叙事驱策,通过虚构化策略再现历史人物人生的创作体裁,马洛与莎士比亚作为"作者之争"的主角经常出现在近期的西方传记研究和生命虚构创作中。达甘在《马洛与莎士比亚秘史》中将学术元素与侦探元素交融在一起,以生命虚构文本而非学术论著的形式再现《哈姆雷特》的创作过程,藉此创设一种另类的"共谋理论",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后现代语境下西方生命虚构叙事的学术化、另类化和不自然叙事化的创作新趋势。 「关键词]《马洛与莎士比亚秘史》;生命虚构叙事:另类"共谋假设"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7)04-0089-05

The Case of the Dead Dane: New Trends in Western Bio-Fiction Narratives

FANG Qun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zhou Maritime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0, China)

Abstract: Western bio-fiction narrative is a literary genre in which a historical personae's life is presented through narrative devices of fictionalization based on narrative imperatives of his/her bio-memes. As the main characters of "disputes over authorship", Christopher Marlow and William Shakespeare frequently appear in recent western biographies and bio-fiction narratives. Integrating both academic and detective elements, Steven Duggan reconstructs, in *The Case Of The Dead Dane*: A Marlowe and Will Mystery, the creation process of Hamlet in the form of bio-fictions instead of academic works, thus creating an alternative collusion hypothesis. To certain extent, *The Case of the Dead Dane* represents the new trends of postmodern bio-fictional narratives, namely, academicalisation, alternativisation and unnaturalisation.

Key words: The Case of the Dead Dane; bio-fictional narratives; alternative collusion hypothesis

文学家出现在虚构作品中这一现象在西方文学中有上千年的悠久传统,但未形成创作趋势。近年来,在西方文学的传记欲望(biographical desire)和传记创作癖好(biographilia)的推动下,以文学家生命故事为叙事驱策(narrative imperative)和叙事出发点(launch-pad)的虚构作品风靡西方出版界,屡获各种文学大奖,席卷各个畅销书排行榜。在马洛逝世420周年的2013年出版的《马洛与莎士比

亚秘史》(The Case Of The Dead Dane: A Marlowe and Will Mystery)不仅是这一潮流中的典范之作,而且在叙事体裁和风格方面颇具独创性。这部由学者型小说家史蒂文·达甘(Steven Duggan)创作的小说融历史虚构、自传叙事、学术研究等体裁于一体,对文学家生命虚构叙事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呈现出明显不同于传记虚构类作品的叙事特征,但这一文学现象在评论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关于

收稿日期: 2017 - 06 - 04

基金项目:广州航海学院创新强校项目"商务英语特色专业建设"(2017JA05)

作者简介:方 群(1977-),女,湖南岳阳人,广州航海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叙事学。

马洛和莎士比亚生命虚构作品的评论极其少见。

本文以生命书写、传记批评和叙事学理论为框架,选取 2013 年和 2015 年出版的《马洛与莎士比亚秘史》上、下两卷进行分析,旨在阐明达甘如何通过将学术元素与侦探元素交融在生命虚构中,以生命虚构文本而非学术论著的形式抛出他所假设的另类"共谋理论",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西方生命虚构叙事在后现代语境下的学术化、另类化和不自然叙事化的创作新趋势。

一 马洛与莎士比亚生命虚构叙事

(一)作者之争:马洛与莎士比亚

西方近期创作中,马洛与莎士比亚作为"作者 之争"的主角经常出现在传记研究和生命虚构创作 中。由于莎士比亚传记资料稀缺,他是否为莎士比 亚名下的诸多戏剧和诗作的真正作者,从18世纪 便开始了作者之争的各种论辩,弗洛伊德、亨利· 詹姆斯和马克・叶温等名人都对莎士比亚作者身 份提出过质疑。[1]各种关于作者之谜的设想层出不 穷,比较集中的研究将作者锁定为牛津公爵培根和 克里斯托弗・马洛。在文学史上, 马洛是一位颇具 争议性的人物,一生充满矛盾和悖论——既是英国 戏剧诗之父、无韵诗首创者、大学才子派领袖,又是 街头恶棍和间谍,并受无神论、同性恋和叛国投敌 等罪名指控。马洛有据可依的生命因子的稀缺和 稀奇使之成为历史臆测和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的 首选,文学史上,"影响说"——亦即莎士比亚的创 作深受马洛影响——在评论界非常流行。[2]

然而,自 1955 年文艺批评家霍夫曼(Calvin Hoffman)在《谋杀那个后来成为莎士比亚的人》(The Murder of the Man Who Was Shakespeare)中提出著名的霍夫曼假说以来,将莎剧的真正作者锁定为与莎士比亚同年出生的马洛的相关作品陆续问世,如威廉姆斯(David Rhys Williams)的《莎士比亚的真名是马洛》(Shakespeare Thy Name Is Marlowe)、沙皮洛(James Sapiro)的《成为竞争对手的剧作家:马洛、约翰逊和莎士比亚》(Rival Playwrights: Marlowe, Jonson, Shakespeare)、波尔特的(Rodney Bolt)《历史戏剧:马洛的多面人生与死后人生》(History Play: The Lives and Afterlife of Christopher Marlowe)、布鲁门菲尔德(Samuel L. Blumenfel)的《马洛一莎士比亚连体:关于作者问题的新研究》(The Marlowe-Shakespeare Connection: A New Study of the Au-

thorship Question)、品克森(Daryl Pinksen)的《马洛的鬼魂》(Marlowe's Ghost: The Blacklisting of the Man Who Was Shakespeare)以及墨菲(Donna N. Murphy)的《马洛 - 莎士比亚连续体》(The Marlowe-Shakespeare Continuum)等,它们都为马洛学说或密谋理论(conspiracy theory)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在生命虚构创作方面,涉及作者之谜以及马洛与莎士比亚关系的作品主要有安东尼·伯吉斯《德普特福德的死者》(A Dead Man in Deptford)、马洛维茨(Charles Marowitz)的《谋杀马洛》(Murdering Marlowe)、洛丝·巴玻尔(Ros Barber)的《马洛手稿:一部诗行小说》(The Marlowe Papers: A Novel in Verse)、贝雅德(Louis Bayard)的《暗夜学派:一部小说》(The School of Night: A Novel)以及达甘的《马洛与莎士比亚秘史》等。

(二)马洛与莎士比亚生命虚构叙事

马洛与莎士比亚生命虚构叙事是指以马洛与莎士比亚为生命虚构人物,讲述文学史上两位著名剧作家生命故事的虚构化作品。更具体地说,就是以马洛与莎士比亚为创作对象,有意识和有目的地将两者的生命因子与史实档案里没有明确记载或明显与史实档案信息相偏离的非生命元素穿插融和在一起,在叙事情节建构过程中对马洛和莎士比亚的生命进程起到推动作用的作品。

在没有将马洛当作莎士比亚作者之争的竞争 对象之前,马洛与莎士比亚几乎没有机会作为虚构 人物同时出现在一部生命虚构作品当中。霍夫曼 假设提出之后,各种对马洛与莎士比亚为同一历史 人物的元虚构批评作品也陆续出版面世。马洛与 莎士比亚生命虚构叙事通过生命文本因子的选取、 文学技巧和叙事策略的合成、重新语境化生命因子 和非生命因子以及虚构体裁的自我揭示这四个虚 构化行为完成创作过程。也就是说,当代作家通过 从马洛与莎士比亚的各种生命文本中选取(selection)适合自己的创作虚构的生命因子,[3]6通过赋 予叙事框架和融入文学技巧并与非生命因子结合 (configuration), [4] 在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的基础上重新组合进入新的语境(re-contextualization),成为一个自我揭示(self-disclosure)为虚 构文类的文本之中。[3]11通过这四个虚构化步骤,马 洛和莎士比亚生命虚构叙事实现了从非虚构文类 向虚构文类的转换,所有生命虚构的书写过程都是 生命因子和非生命因子的交织重构的过程,藉此,

文学家、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理论文学走入虚构的情 节中。

(三)后现代西方生命虚构叙事

马洛与莎士比亚生命虚构是传记虚构在后现代语境下的文本产物和升级形式。后现代生命虚构叙事与传记虚构作品的明显差异在于"传记"这一字眼暗含历史人物整个人生历程的记录,而生命虚构的跨度既可以涵盖一生,也可以只书写某段人生,甚至可以只描述几小时里发生的生命故事。[5]31 如威尔士(Louise Welsh)的《帖木儿必死》(Tamburlaine Must Die)等讲述马洛死前几天发生的故事;而《马洛与莎士比亚秘史》则集中讲述马洛与莎士比亚创作《哈姆雷特》的过程。正如另一部马洛生命虚构作品《历史剧:克里斯托弗·马洛的多面人生与死后人生》的作者波尔特所言,一般的传记虚构作者审视史料,然后演绎出一个故事,而生命虚构作家大多想象一个故事,然后再用同样稀少不全的史料支撑他们的故事。[6]

传统传记小说将虚构因子填补在一个以传记 资料支撑的整体叙事框架中,虚构的作用在于实现 叙述连贯性,在于逻辑推理(logical inference)的合 理性,[7]让读者看到一个关于马洛或莎士比亚一生 经历的完整人生故事。然而,后现代马洛生命虚构 作品则可以按照创作者的需要创设虚构的叙事框 架,目的可能只在于探讨一个关于作家身份的难 题,虚构策略主要体现在虚构或杜撰人物的设置、 另类化生命进程、不自然叙事元素的创设等方面。 后理论语境下,马洛和莎士比亚生命虚构叙事已经 成为马洛或莎士比亚学者进行理论批评的一种新 媒介,是马洛和莎士比亚学术批评的虚构化倾向和 虚构作品的学术化倾向双重作用的文本产物。马 洛的虚构创作者,如伯吉斯、巴玻尔(Ros Barber)和 达甘等学者型小说家,将历史人物变成虚构人物, 置于小说般的叙事进程中进行严肃解读,并借虚构 文类建构关于马洛之死和莎士比亚作者身份之谜 的理论观点。因而,在后现代语境下,西方生命虚 构叙事是生命书写、虚构、批评等元素的合体。[8]

二 西方生命虚构叙事创作的特征

(一)学术与侦探元素的交融

21世纪以来,许多学者、研究者、学术型传记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如巴玻尔、达甘、马洛维茨(Charles Marowitz)等加入马洛生命虚构创作行列,

将历史虚构、生命再现、学术叙事等体裁融于一体, 为各自的理论阐释找到了更为广阔的平台。

达甘教授从事马洛与莎士比亚戏剧教学和研 究工作20余年。达甘透过生命虚构这一文类载体 不仅展现了年轻时代的莎士比亚在伦敦戏剧舞台 上打拼的艰辛生活以及他与妻子安(Anne Hathaway)的感情经历,更重要的是虚构了《哈姆雷特》 (Hamlet)这部经典戏剧的创作缘起和过程。如前 所述,大多数关于莎士比亚作者之争的生命虚构或 传记作品都质疑是否真有莎士比亚其人,也就是 说,它们强调莎士比亚与其他可能的作者人选是同 一个人的两个不同身份。然而,与这些假说完全不 同的是, 达甘认为马洛和莎士比亚是两个独立存在 的人物,并且他们的生活和创作是有交集的,因而, 《马洛与莎士比亚秘史》虚构性预设出一个假说,亦 即《哈姆雷特》是马洛根据他与莎士比亚在伦敦和 丹麦的共同经历创作出来的。达甘的这一预设也 巧妙地回避了"马洛与莎士比亚作者之争"这一问 题,将两位剧作家另类化为联手创作的搭档,也可 谓别出心裁。

《马洛与莎士比亚秘史》并非一部简单的寻找真 凶的侦探小说。像许多文学家生命虚构作品一样, 马洛和莎士比亚被赋予戏剧家之外的其它身份,成 为了深入探求疑难案件的侦探。这部小说实际上 是借侦探类型小说的套子,进行"文学思辨"和"学 术探讨"。在这点上,这部作品与近年来受评论界 赞誉的其它几部小说,如《爱·伦坡暗影》(Poe Shadow)、《但丁俱乐部》(Dante Club)等具有相似 之处。作为一部虚构化的学术批评作品,《马洛与 莎士比亚秘史》融入了达甘对伊丽莎白时代的历史 和马洛与莎士比亚相关的大量史实考据,引领读者 像侦探一样去探寻掩盖在案件侦破表面下的作家 的真实叙事意图,让读者去思考《哈姆雷特》在现实 世界中的"真实历史"。

(二)另类化叙事

在这部另类生命虚构叙事中,马洛和莎士比亚同是伊丽莎白时期伦敦的跑龙套的演员,穷困潦倒的两位年轻人希望通过冒险改变各自的命运。他们抓住了一个来访的挪威贵族福丁布拉(Fortinbras)提供的机会,决定前往丹麦去侦办赫尔辛诺城堡(castle in Helsinore)的继承谜案。然而,历史文献中并没有马洛和莎士比亚一同前往丹麦的任

何记录,更没有他们一起受雇干挪威王子(Prince Fortinbras of Norway) 联手查案的相关说法。很明 显,城堡的前堡主克劳斯(Klaus)夫妇被克劳斯的 继子埃姆雷斯(Amleth)所杀,但唯一的见证人一位 叫做霍拉蒂奥(Horatio)的大学密友在事件发生之 后被福丁布拉的亲信处决了。为什么埃姆雷斯要 谋杀克劳斯一家?福丁布拉的亲信索仁(Soren)为 什么要让霍拉蒂奥销声匿迹?两位侦探如何通过 埃姆雷斯以前的同窗罗森博格(Rosenberg)和吉尔 登斯坦(Gildenstein)获取信息对埃姆雷斯的性格进 行各种推断?如何遇到埃姆雷斯的表妹和爱人奥 菲莉亚(Ophelia),并在她的帮助下从一系列鱼目 混杂的信息里推理出接近真相的线索。带着推理 能力的莎士比亚和带着间谍气质的马洛卷入这一 宗宗谜案,冲破从赫尔辛诺的妓院酒馆到哥本哈根 大学的侦查过程中形形色色人物的重重阻挠,一步 步地接近事实真相。他们重新回到伦敦之后,这两 位雄心勃勃、崭露头角的戏剧家最终将调查谜案的 经历用于他们自己的戏剧事业,成功地推出了《哈 姆雷特》文部轰动整个英国的悲剧中的悲剧。文部 作品通过另类化叙事讲述了两位剧作家的命运和 悲剧《哈姆雷特》的创作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部 具有元虚构特点的创作过程小说(Poioumenon), [9] 这是文学家生命虚构在后现代语境下的重要特点。

在创作《马洛与莎士比亚秘史》的过程中,达甘在虚构和史料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为把握适当的尺度,达甘对小说进行了准确定位——作品的主要意图是讲述一个引人入胜的好故事,研究史料只是围绕讲好这个故事而使用的修辞手段。当然,他必须缜密地思考如何加入想象和虚构的元素,将史料串联成合情合理、天衣无缝的情节。整篇小说中,达甘将他在研究过程中的第一手资料和史料片断作为戏剧化修辞手段,在整个叙事中不失时机地将莎士比亚与马洛的经典名言贯穿在小说行文之中。《马洛与莎士比亚秘史》一方面交织着马洛和莎士比亚以及其他历史人物的生命因子,另一方面融入了达甘自己的学术见解和对悲剧《哈姆雷特》的另类化阐释,是一部学术型生命虚构作品。

(三)不自然化叙事

创作过程虚构分两种类型,一是虚构一部某位 真实文学家的手稿或回忆录日记之类的作品,然后 叙述它的创作背景、原因、思路和写作过程;另一类 是历史上确实存在的某位文学家创作的虚构作品 的写作过程,《马洛与莎士比亚秘史》属于后一 类型。

仔细阅读《马洛与莎士比亚秘史》,会发现福丁布拉、霍拉蒂奥、罗森博格、吉尔登斯坦、奥菲莉亚和埃姆雷斯这一系列人物并非与马洛同一时期生活在丹麦的历史人物,而是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里的人物。有些人名直接对应,有些做了小的变化,如 Rosenberg 对应《哈姆雷特》剧里的 Rosencrantz, Gildenstein 对应 Guildenstern,还有的玩了点文字游戏,如 Amleth 是由 Hamlet 颠倒字母顺序而构成的名字。藉此策略,马洛的生命故事呈现出不自然化叙事趋势。

在这部作品中,不自然化叙事的最重要表现是 虚实错层叙事。虚实错层叙事指的是虚构人物的 故事世界与文学家真实生命世界交错的情况。文 学家生命虚构与其他类型人类生命虚构的显著区 别在于文学家生命虚构可参照的生命文本即文学 家自己创作的虚构作品要处于一层次。原则上,作 家的人生故事与所创作的某部虚构作品是两个相 对封闭的世界。然而,在违反现实主义参数的反模 仿错层叙事中,时空的模仿概念往往被解构。比 如,在威尔士(Louise Welsh)《帖木儿必死》(Tamburlaine Must Die)中,马洛必须在三天之内在伦敦 街头找出从他最残暴的一出戏剧的书页里逃出来 的杀人魔王帖木儿。在《马洛与莎士比亚秘史》中, 《哈姆雷特》中的虚构人物哈姆雷特、格特鲁德、克 劳狄斯、奥菲莉亚等从他们的故事世界里走出来, 马洛和莎士比亚分别从他的人生世界里走出来,在 新的虚构文本世界相遇,藉此,达甘以另类的文学 理念重新阐释了《哈姆雷特》的创作过程。

对于文学家生命虚构作品来说,无论是哪种形式的错层叙事,最重要的修辞意图是模糊"真实"与"虚构"之间的二元对立,颠覆虚构人物和真实人物之间的本体界限,体现当代作家的元生命书写意识。在这个虚实交错的新故事世界里,《哈姆雷特》里的虚构人物通过与历史人物的互动获得某种真实感,而历史人物与虚构人物的同台演出则营造了某种虚构性,两个不同故事世界里的人物通过相向运动进入同一故事世界获得了界阈身份。马洛与莎士比亚在丹麦进行的谋杀侦探活动基本平行于《哈姆雷特》里的情节,因而,《马洛与莎士比亚秘史》可以视为达甘将《哈姆雷特》从抑扬格五音步的白韵体形式转译为散文化小说形式的一种平行

叙事,[11]不同的是《马洛与莎士比亚秘史》在《哈姆雷特》的再虚构平行叙事之中加入与它的创作者马洛和莎士比亚相关的生命虚构叙事元素。

马洛与莎士比亚生命虚构作品中出现的学术 化、另类化和不自然叙事化特征代表了后现代语境 下西方生命虚构叙事创作的新趋势,并对其他文学 家生命虚构作品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虽然 属于虚构作品,但达甘为创作《马洛与莎士比亚秘 史》做了大量细致的文献研究工作,通过虚拟话语、 混搭叙事和错层叙事等多种虚构化策略,天衣无缝 地将文学家的传记因子、另类化生命因子和不自然 生命因子融合在一起。达甘藉由生命虚构叙事阐 明了他本人对作者身份、传记写作、历史虚构等的 反思与理解,代表着后现代创作的一种双向趋势, 亦即虚构作品学术化,学术作品虚构化的趋势。因 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部作品也可以称作元作 家生命虚构的典范之作,将后现代历史小说和生命 虚构叙事实验推向更深层次。

这部与马洛和莎士比亚相关的生命虚构叙事不仅以另类的方式让读者加深了对马洛和莎士比亚生平以及作品的了解,也激起了读者重读经典作品的热情。达甘用生命虚构叙事形式替代学术著述形式,借用侦探叙事的悬念效果,力图跨越高雅艺术和商业形式之间的鸿沟,将文学家生命故事从曲高和寡的大雅之堂推广到通俗易懂的读物中,实现了读者群的最大化。也就是说,在后理论时代,当代作家通过生命叙事将学术思想以虚构化叙事这一受众范围更广、阅读门槛更低的模式表达出

来,为文学理论和批评带来了一场阅读革命。

参考文献:

- [1] JOHN M. Who Wrote Shakespeare? [M]. London: Faber & Faber, 1996:1.
- [2] LOGAN R A. Shakespeare's Marlowe: The Influence of Christopher Marlowe on Shakespeare's Artistry [M].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2007:1.
- [3] WOLFGANG Iser. The Fictive and the Imaginary: Charting Literary Anthropology [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 [4] ANSGAR Nunning. Biofictions: The Rewriting of Romantic Liv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and Drama [M]. New York: Camden House, 1999:43.
- [5] 杨晓霖. 有关亨利·詹姆斯的生命虚构叙事[J]. 广东 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16(3):31-37.
- [6] RODNEY Bolt. History Play: The Lives and Afterlife of Christopher Marlowe [M]. New York: Bloomsbury USA, 2005:84.
- [7] CONSTANCE Kuriyama. Christopher Marlowe: A Renaissance Life [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1.
- [8] MICHAEL Benton. Literary Biography: The Cinderella of Literary Studies [J].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2005,39(3): 44-57.
- [9] ALASTAIR Fowler. 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372.
- [10] YANG Xiaolin. Application of P&RBL Model to English Literature Course [J]. Theory and Practice in Language Studies, 2015(3): 512 517.

责任编辑:李珂